

## 【论 文】

# 费孝通先生的民族问题研究<sup>1</sup>

马 戎<sup>2</sup>

**摘要：**费孝通先生一生与民族研究之间有着深厚的学术渊源。本文主要从费先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工作梳理他的民族研究脉络。他从在清华学习人类学专业开始，随后开展广西大瑶山调查，1938年留学归国后在云南继续开展农村调查，介入“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建国后参与政府组织的“民族识别”工作，改革开放后遍访少数民族地区，思考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并在1988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为中国民族史和今后的民族关系发展提出一个宏观理论框架，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认可。费先生的民族研究探索和心路演进，为我们今后的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关键词：**民族、民族识别、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先生1910年出生在江苏吴江。今天我们所说的“民族问题”，那时在他的家乡社会中并不突显。据费先生自己讲：“我生长在江苏，小的时候，脑子里一点也没有少数民族的概念，也不知道自己是汉族。后来，听我父亲讲反清、反满，于是我脑子里有了满族的概念。后来有了‘五色旗’，我们在小学念书的时候说：‘我们的国旗红黄蓝白黑，汉满蒙回藏’，才知道还有别的民族。我对民族的认识是从这里开始的”（费孝通，1991）。费先生少年时代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表当时中国沿海和中部汉人聚居区民众普遍的思想状况。他们之所以意识到“满”“汉”这两个对应的概念，盖源自清末部分汉人精英反满排满宣传的影响<sup>3</sup>，而“五族共和”只是民国初年出现的一个十分抽象的概念。

在20岁的那一年，费先生离开东吴大学来到北京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从此开始了求学和研究生涯。如果我们追溯费孝通先生一生与民族研究之间的学术渊源，可以大致从他在几个历史时期的学术和研究工作来加以讨论。

### 1. 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生时代

费孝通先生来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后，开始接触欧美社会学、人类学著作并直接聆听欧美学者（如 Robert Park, Alfred Radcliffe-Brown）讲授的课程。以派克教授为代表的美国芝加哥学派在研究新兴移民城市的多元化社区时，必然会涉及种族/族群关系议题，布朗教授从社会人类学视角调查亚非拉的土著群体，他的研究必然涉及到今天民族研究的许多重要维度。布朗教授的研究成果如《安达曼岛人》，在当时即由学生之一的杨开道撰写了该书介绍并编入1936年的《社会学界》第九卷。费孝通先生作为学生也参与派克教授、布朗教授在燕京讲演文稿的翻译整理工作<sup>4</sup>，他对于这些研究内容、理论思路和研究方法应当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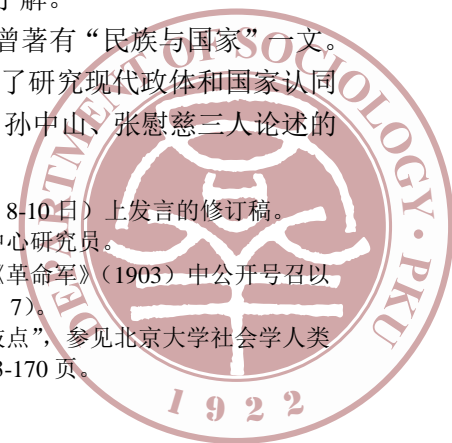
当时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是吴文藻教授，他在1926年曾著有“民族与国家”一文。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关于“民族主义”、“民族”的著述在国内开创了研究现代政体和国家认同的新领域和新风气，吴文藻先生这篇文章的基本脉络即是从梁启超、孙中山、张慰慈三人论述的

<sup>1</sup>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大学召开的“第二届费孝通学术思想研讨会”（2016年7月8-10日）上发言的修订稿。

<sup>2</sup> 作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社会学系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sup>3</sup> 当时一些汉人精英如章太炎等积极煽动反满排满的狭隘汉民族主义。邹容在《革命军》（1903）中公开号召以满人为对象的种族清洗：“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邹容，2002：7）。

<sup>4</sup> 费孝通先生翻译的一篇题目为“派克及季亭史二家社会学学说几个根本的分歧点”，参见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2002），第143-170页。



梳理开始（吴文藻，1990）。费孝通先生作为他的学生，必然受其影响，而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新锐政论和学术著作应该也在他阅读之列

1933-1935年费孝通先生进入清华大学，在史禄国教授（S. M. Shirokogoroff）的指导下攻读人类学硕士学位。史禄国教授一方面安排费先生作系统的人体测量训练，同时自己正在撰写有关通古斯人的研究。从费先生晚年的笔记来看，史禄国教授有关 Ethnos 的论文对费先生思考中国民族问题影响很大。

史禄国教授曾为费先生安排了六年的学习计划，前两年主要学习体质人类学。所以1935年当他与新婚妻子一起赴广西大瑶山调查时，他在搜集资料方面的重点是当地居民的体质测量。因为史禄国教授在1935年离开清华大学，这一学习计划被迫中断，这也是费先生获得硕士学位后，转赴英国继续求学的主要原因。

## 2. 1935年大瑶山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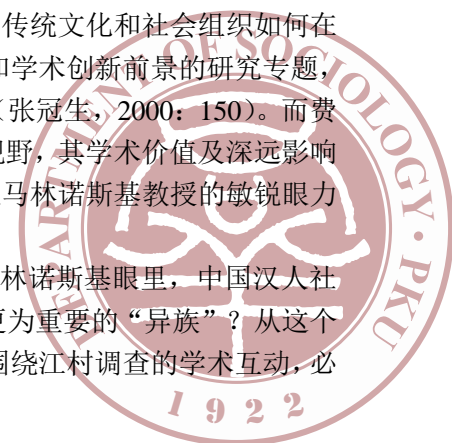
真正使费孝通先生开始实地接触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经历是他的1935年大瑶山调查。在调查分工中，费先生专注于当地居民的人体测量，他的新婚妻子王同惠女士侧重于社会家庭情况调查。由于此前王同惠曾翻译了法国传教士许让的《甘肃土人的婚姻》一书，她对中国少数民族的基层社会情况有一定了解。王同惠不幸遇难后，费先生开始整理她的研究笔记，编辑成《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费先生在给同窗好友们的信中写到当时他们在瑶山调查的情景：“我总有一两天听她讲她所搜集得的材料。——这些材料我们在古陈时已经整理了一下，所以我都有底子，等我一能起身就可以写成出版”（张冠生，2000：120）。这次实地调查使他有幸深入偏远山区，亲身接触当地少数民族基层社区和日常生活，并在对《花篮瑶社会组织》书稿的整理编辑中对“家庭”、“亲属”、“村落”、“族团及族团间的关系”这几个基础专题进行系统的介绍和讨论。大瑶山调查可以说是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的第一个阶段。

## 3. 马林诺斯基如何看待江村研究

费孝通先生抵达英国后，系里最初为他指定的导师是雷蒙德·弗斯（Raymond Firth），费先生向弗斯教授介绍了自己的主要研究经历即瑶山调查，也顺便提及养伤期间在吴江的农村调查。他曾预期英国人类学家会对“原始土著人调查”更感兴趣，不料弗斯教授为他选定的论文主题却是江村调查。更值得注意的是，等到马林诺斯基教授（Bronislaw Malinowski）回到英国后，他听到费先生介绍自己的选题之后，便利用自己在大学里的权威身份把费先生转归自己亲自指导。作为当时国际人类学最权威的学者之一，马林诺斯基教授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选题呢？

在为该书英文版写的序言中，马林诺斯基教授写道：“此书……有意识地抓住现代生活最难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中国社会学界已独立自发地组织起一场对文化变迁和应用人类学的真正问题进行学术上的攻关。这一学术进攻表达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费孝通，1986：1，3）。当时国际人类学界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以土著人为对象开展的人类学研究已有一定规模和深度，这些土著人群体的社会组织和文化都不发达，虽然各有特色但仍兼有许多共性，增加一个瑶族研究不过是在这个“土著社会”研究系列上再延续一个案例。而正如马林诺斯基教授所述，像中国这样具有几千年历史文明古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如何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发生变迁，是一个另辟学术新径、更具挑战和学术创新前景的研究专题，标志着传统人类学的重要学术转型，“比较文化论，不能缺少中国”（张冠生，2000：150）。而费孝通先生的江村调查，恰恰在这个历史时刻进入马林诺斯基教授的视野，其学术价值及深远影响与瑶族研究绝对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佩服马林诺斯基教授的敏锐眼力和学术睿智。

在费先生的眼里，瑶族是具有特定文化传统的“异族”。而在马林诺斯基眼里，中国汉人社会何尝不是具有特定文化传统、而且在世界文化板块和世界历史中更为重要的“异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伦敦经济学院两年期间马林诺斯基教授与费先生之间围绕江村调查的学术互动，必



然在许多领域和维度上加入了中国汉人社会与欧美社会、各地土著人社会之间的比较。从这个意义上讲，马林诺斯基教授可能把江村也归入自己的“异族研究”范围之内。

#### 4. “魁阁”时期

1938年费先生回国后，即开始了在云南的实地调查工作，于同年年底进行了禄村调查。1939年他在云南大学正式任教后，在呈贡建立了云南大学社会学系附设的调查工作站（即“魁阁”），组织了易村和玉村调查。在1939-1945年“魁阁”运行的6年期间，尽管费先生自己直接参与的社会调查并未涉及到少数民族群体，但是当年“魁阁”成员如田汝康对“芒市边民”的研究、林耀华对“凉山夷家”的研究、许倬光对大理“两镇”的研究等，与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社会都有十分直接的关联（潘乃谷，2005：74-75）。当时国内还没有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一些群体（如白族）被认为是汉人，一些群体的名称（如彝族）也尚未统一。作为抗战时期一个十分特殊的青年学术群体，“魁阁”成员们彼此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其他成员对少数民族群体开展实地调查所得到的收获和感悟，相信费先生一定有所分享。

在抗日战争后期，能够维持大学和研究机构正常运转的大后方如云、贵、川、甘等地区都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这一时期有不少著名学者在西南地区开展了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如吴泽霖先生开展的贵州苗族研究、杨成志先生在滇中和滇东开展的彝族研究、江应樑先生和李景汉先生对傣族的研究、柯象峰先生对西康社会的调查等（潘乃谷，2005：78）。另外在西北地区还有李安宅先生对拉卜楞寺的著名调查。这些学者都有留学欧美学习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背景，功底深厚，相互之间交流密切。费先生对这些民族地区开展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成果应该是熟悉的，加上他自身的瑶山调查，这些经历为他建国后参加西南地区“民族识别”工作奠定了知识基础。

#### 5. 1939年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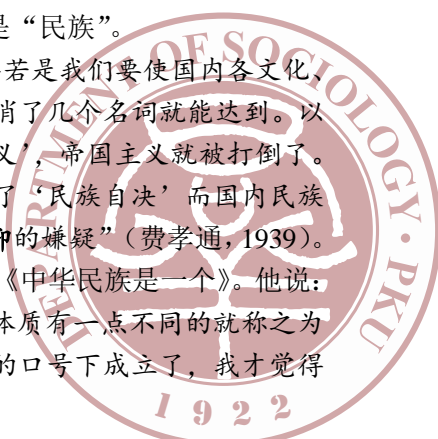
在此期间，有个插曲是不可不说的。1939年2月，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华民族是一个》。文章明确提出，以现代的政治观念来看，在中国只存在一个“中华民族”，人们常说的“五大民族”等，都不宜称作“民族”。把中国的汉、满、蒙、回、藏等群体都称之为“民族”，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分化和瓦解中国的策略和阴谋。“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顾颉刚，1939a）。

当时费先生回国仅一年，读到顾先生的这篇文章后，费先生从他在英国学习人类学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的藏、蒙、满等都是“民族”，所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为“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投给顾先生主编的《益世报·边疆周刊》，发表在该刊第19期。

从今天的学科视角来看，这是一位在中国成长的历史学家和一位由西方培养的人类学家之间的对话。西方人类学的传统研究对象是处在“未开化或半开化”的野蛮人群体。费先生曾在清华大学史禄国教授指导下学习体质人类学，并运用这套知识体系在大瑶山对当地瑶族进行人体测量。所以经受了西方人类学熏陶的费孝通先生，很自然地认为汉、满、蒙、回、藏、苗、瑶这些具有不同祖先、语言和文化传统的群体应当被看作是“民族”。所以他在文中强调“我们不必否认中国境内有不同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不必否认这些团体是“民族”。

针对顾先生对中华民族分裂的担忧，费先生的观点是：“我们觉得若是我们要使国内各文化、语言、体质的团体在政治上合作，共谋国家的安全和强盛，决不是取消了几个名词就能达到。以前我们时常太相信了口号标语的力量，以为一经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被打倒了。现在我们又逢着了国内‘民族’间有分化的倾向，而以为是敌人喊出了‘民族自决’而国内民族真的在谋‘自决’了。——这都是把名词的作用看的太重，犯着巫术信仰的嫌疑”（费孝通，1939）。

随后顾颉刚先生发表了两篇文章，与费先生讨论他为什么要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他说：“我当初使用这‘民族’一名正同你的意思一样，凡是文化，语言，体质有一点不同的就称之为一个民族。……但是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觉得



这‘民族’不该乱用，开始慎重起来”（顾颉刚，1939b）。他以自己亲赴张家口与坚持“蒙古自治”的德王打交道的生动经历，和他访问甘肃、青海观察当地回汉冲突的亲身感受表明：当“敌人喊出了‘民族自决’”时，这绝不仅仅只是“名词”而已，而是他亲眼看到的真真切切的事实：“国内民族真的在谋‘自决’了”。

“民族”是鸦片战争后才进入中国话语体系的一个概念<sup>1</sup>，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概念时，需要追溯西方国家民族主义理论的脉络。强调民族的“政治层面”（国家的组织，平等的公民权等）的观点比较接近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归纳的“公民的民族模式”（civic model of the nation），这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领域。而看重语言、文化和体质等因素的观点则更接近安东尼·史密斯提出的“族群民族主义模式”（ethnic model of the nation）（Smith, 1991: 11），这是研究非西方传统文明群体的西方人类学家最关注的领域。

1939年是中国抗日战争处于十分危机的时刻，日军攻占南昌，轰炸重庆造成平民重大伤亡，汪精卫公开投日组建伪政府，在这个历史关头，担心国家存亡显然比关注各群体语言、血缘特征差异更为急切。顾颉刚先生坦诚地谈到自己对人类学知识的局限，同时强调，他的亲身感受和家面临的紧迫危机使他必须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他写道：“我虽是没有研究过社会人类学，不能根据了专门的学理来建立我的理论，可是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顾颉刚，1939b）。

在1939年已经46岁并因发表《古史辨》而在中国史学界享有盛誉的顾颉刚先生，对于统一的中华民族演变历史的文献非常熟悉，对于中国在现实世界格局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政治实体的认识也根深蒂固。而刚刚走出学校大门、年仅29岁的费孝通先生，则更多受到史禄国教授、马林诺斯基教授的西方人类学传统的影响，自然会比较强调群体间各种差异的重要性，担心人们忽视不同群体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多样性。围绕着“中华民族是一个”这一主题，60多年前发生在年龄阅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经历不同、关注重点不同的两位学者之间的对话，可以给我们提供许多超越具体观点、非常重要的启示。这两类不同学术传统和关注取向之间的对话，其实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1993年在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会上，费孝通先生回顾了1939年他与顾先生之间的这场争论：“我看了这篇文章（顾先生的文章）就有不同意见，认为事实上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我在出国前调查过的广西大瑶山，就有瑶族，而瑶族里还分出各种瑶人。不称他们为民族，称他们什么呢？……我就给顾先生写了一封信表示异议。……后来我明白了顾先生是激于爱国热情，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成立‘满洲国’，又在内蒙古煽动分裂，所以义愤膺胸，极力反对利用‘民族’来分裂我国的侵略行为。他的政治立场我是完全拥护的。虽则我还是不同意他承认满、蒙是民族是作茧自缚或是授人以柄，成了引起帝国主义分裂我国的原因。而且认为只要不承认有这些‘民族’就可以不致引狼入室。借口不是原因，卸下把柄不会使人不能动刀。但是这种牵涉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所以我没有再写文章辩论下去”（费孝通，1993: 30）。

在这段话中，费先生说明了当年自己写这篇反驳文章的原委以及后来没有再继续进行争论的主要考虑。

## 6.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工作及1980年费先生对此的回顾

<sup>1</sup> “在中国古籍里，经常使用‘族’这个字，也常使用民、人、种、部、类，以及民人、民种、民群、种人、部人、族类等字。但是，‘民’和‘族’组合为一个名词则是后来的事。1903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梁启超把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介绍到中国来以后，民族一词便在中国普遍使用起来，其含义常与种族或国家概念相混淆，这与西欧的民族概念的影响有密切关系”（《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会，1986: 302）。



费先生在“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一文中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的研究工作重点转向了民族研究。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转向主要是由于当时客观形势的改变”（费孝通，1996：89）。

1950年和1951年，费先生被任命为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兼第三分团团长，负责领导贵州、广西两个省的实地访问工作，写出“关于贵州少数民族情况及民族工作报告”及其他文章。这是自瑶山调查后他再一次有机会深入少数民族聚居区，感受到了“土地改革”对少数民族社会与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这次在贵州和广西的基层访问，实际上也使费先生加入到当时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他回忆说：“当时访问团的一个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同时要搞清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这叫民族识别。……如土家族在50年代初就没有被确认为单一的民族。现在广西的壮族，那时我们访问团去时，就不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费孝通，1991）。他在1980年写作“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所依据的材料（如对“穿青人”的识别），许多来自1950年的贵州实地访问。

在“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一文中，费先生首先批判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1943）中“把那些历来公认的许多民族都说成是汉族的宗支”的观点，认为“这是赤裸裸的大汉族主义，目的是在压迫和消灭国内的少数民族。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实现了民族平等。长期被压迫的许多少数民族纷纷公开他们的民族身份，提出自己的族名。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费孝通，1985：1）。“我们所用的‘民族’一词历来不仅适用于发展水平不同的民族集团，而且适用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集团。这是一个涵义广泛的名次。这一点和欧洲各国的传统是不同的”（费孝通，1985：5）。

“在开始进行民族识别工作以前，我们曾反复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关民族问题的理论，特别着重学习了斯大林著名的有关民族的定义，……我们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西方民族的科学总结，应当作为我们进行民族识别的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怎样运用这个理论来研究我国具体的民族情况是我们做好民族识别的关键”（费孝通，1985：12）。

无论是对国民党“宗支/宗族论”的批判还是把斯大林民族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这些观点反映出，费先生在50年代已经完全离开了西方人类学传统，转而接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话语。

在50年代的在新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理论，共产党享有空前的威望，而战胜德日两大法西斯国家的苏联，则是新中国各行各业和各个学术领域的榜样。1952年底，全国各大学的社会学系陆续被取消，许多著名教授和知识分子在“三反”运动中对自己进行彻底批判。1952年，费先生写的第三次检讨报告的标题是“清洗自己，站进人民队伍”。在这份检讨中，他自述：“我深刻反省，发现我的进步面貌只是一件外衣，外衣里面是丑恶的、肮脏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改良主义。……我当时崇拜英美学位的思想证明已经失去了民族立场。……资产阶级的学术从来没有脱离过政治，一直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张冠生，2000：314-317）。由于如此深刻地进行自我批判，费先生的检讨得以过关。自1949年一直到1980年，费先生完全接受共产党的政治话语和民族理论，这在当时政治和社会氛围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组织一个科研队伍对中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一次全面的社会历史调查，费先生只参加了开始的一段，负责筹备、组织和开始时在云南省的实地调查。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费先生停止参与该项工作，这也是他多次感到遗憾的事。他后来提到，他当年曾经很想通过实地调查来回答自己心中的一系列问题。

“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一提民族工作就是指有关少数民族事务的工作，所以很自然地民族研究也等于是少数民族研究，并不包括汉族研究。……（当年）访问团只访问少数民族，并不访问汉族。这样的任务决定了工作的程序也以一个一个少数民族为对象分别进行访问。



在我们组织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也是同样安排，最后还是以一个少数民族为单位编写出各族的历史，55个少数民族各有一本简史，共55册。初看来这种体例倒也是顺理成章的，深入推考一下，使我想到了这种分民族写历史的体例固然有它的好处和方便的地方，但是产生了我上述的困惑。……我的困惑出于中国的特点，就是事实上少数民族是离不开汉族的。如果撇开汉族，以任何少数民族为中心来编写它的历史很难周全。困惑我的问题，在编写‘民族简史’时成为执笔的人的难题”（费孝通，1999：99-100）。非常可惜，“反右”运动打断了费先生的研究计划。

在1934年及随后的几年中，中国连续出版了几部《中国民族史》。这些著作可大致分为两种体例，第一种以王桐龄为代表，以历史分期为章节，分析介绍各历史时期内各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迁移、通婚、社会交往等）（王桐龄，1934），第二种以吕思勉、林惠祥为代表，以不同族群为章节<sup>1</sup>分别进行论述（马戎，2012：29-30）。林惠祥留学于美国殖民地菲律宾，很可能接受了美国学术界“分族调查”传统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社会历史调查和随后的成果编纂思路，一是无疑受到苏联“民族识别”工作思路的影响，当时苏联专家曾以不同程度指导并直接介入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sup>2</sup>；二也有可能多少受到30年代林惠祥研究思路的影响。在费先生50年代初访问的贵州、广西等地，各族混居共处通婚已许多世纪，以“分族”体例叙述各自历史确实显得十分生硬和勉强。费先生因此而联想到各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在历史叙述中“不可分”，从而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的整体结构，这为他后来写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埋下伏笔。而在我国今天的民族研究尤其是民族史研究中，“分族体例”仍然是主流，可见费先生当年的思考至今仍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 7. 1980年代的“行行重行行”

改革开放后，费先生又开始参与有关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他担任了1981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一书的顾问，参与书稿的审读。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中，他担任“世界民族”部分的主编，还作为顾问参与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写的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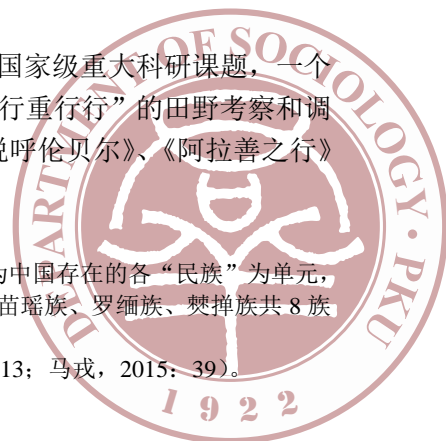
在这一时期，费先生也在多个场合提到了当年参与的“民族识别”工作。1980年费先生在讨论“民族识别”的余留问题时，他指出“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是在历史中形成、变化、消亡的，各民族一直处在分化融合的过程中”。提出“着重于分析这个比较复杂的分化融合过程，……必须严肃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对待”（费孝通，1985：26）。这表明经过瑶山、贵州和广西的实地调查活动，费先生对我国民族问题的区域多样性和复杂程度十分清楚。

在1996年“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一文中，费先生在讨论当年如何实地灵活应用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时，分别分析了这一定义的“四大特征”。对于“共同地域”这一特征，他提到：“我们在识别工作的实践中提出了‘民族聚居区’的概念加以补充和修正。我们承认同一民族的人倾向于居住在同一的地区，但是不应把‘同一地区’和‘共同地域’等同起来，因为同一地区里可以有不同民族的人共同聚居在内。……我觉得我们以‘民族聚居区’的概念代替民族定义中的‘共同地域’为特征的认识是值得令人深思的”（费孝通，1996：94）。中国政府后来为各民族划定“自治地方”时即采用了“民族聚居区”的概念，并写入我国的宪法：“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费先生认为这是他们当年的贡献之一。

在国家“七五”计划（1986-1990年）期间，费先生主持了两个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一个是小城镇和新型城镇发展，一个是边区开发和少数民族发展。在“行行重行行”的田野考察和调研过程中，他写下《赤峰篇》、《包头篇》、《甘南行》、《临夏行》、《话说呼伦贝尔》、《阿拉善之行》等一系列文章，讨论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

<sup>1</sup> 当时还没有官方“民族识别”的56个“民族”的框架，学者们以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存在的各“民族”为单元，如林惠祥把中国“现代之民族”分为：汉族、满洲族、回族、蒙古族、藏族、苗族、罗緬族、彝掸族共8族（林惠祥，1939：9）。

<sup>2</sup> 如我国壮族语言“标准音”地点的确定，就是苏联专家最终决定的（卢露，2013；马戎，2015：39）。



费先生在 1983 年和 1988 年先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可以说自 1983 年后他是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开展各地的访问与调查活动，接受当地各级政府的工作汇报。同时，作为民盟中央主席，他也必须时时思考作为一个参政党在每年“两会”上的提案内容。在这一时期，他所调查和关注的已不再是体质、语言、文化和亲属制度等人类学家的传统专题，而转向了与各地民众就业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在座谈与户访中关注的主要议题是不同地区的各族民众如何能够在政府帮助下脱贫致富、参与全国的现代化进程。此时费先生的社会角色已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使他已不可能像 1949 年以前那样完全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和心境来开展调查和研究工作了。

## 8. 1988 年发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但是，费先生在 50 年代初产生的关于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关系以及什么是“中华民族”的困惑始终没有解开。1988 年费孝通教授接到香港中文大学“特纳讲座”的邀请，这是一个高水准的国际学术论坛。在这次邀请的推动下，他在 50 年代初中央民族学院上课时留下的一本讲义和后来相关思考的基础上，完成了在中国民族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78 年费先生在联合国大学日本京都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就已经提到“中国的这许多民族……通过交流、混杂、融合、分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促进，共同缔造了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整体——中华民族”（费孝通，1985：30）。这一思想在他的这次讲座中得到充分展开和发挥。他说“我不是专攻历史学的人，但对过去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写成的中国的历史一直有反感。怎样能跳出这个观点来写中国历史呢？”（费孝通，1996：100）这个心愿最后落在了这篇讲稿上。

根据考古成果和历代文献，费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归纳，他既跳出了以中原王朝断代史的体例来叙述中国史的史学传统，也跳出了分族别撰写“民族史”的民族研究传统，而是从地理空间、多元起源、多元交融汇集、凝聚中心、多元统一、民族大融合、民族流动、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特点这样一个顺序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框架，从各方面对这个理论框架进行了论述，努力以这个“多元一体”的演进过程来勾勒一部延续几千年的中国史。

费先生在详细列举了各个朝代的迁移、混居和通婚现象后强调指出，“在看到汉族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其它各民族的成分时，不应忽视汉族也不断给其他民族输出新的血液。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可以说中华民族这个一体中经常在发生混合、交杂的作用，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在这个基础上他完全承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存在：“我将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元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费孝通，1989：1）。这个定义就是以“国家公民”身份来界定“民族成员”、强调政治层面的“公民的民族模式”。费先生阐述了在历史的长河中，“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元，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费孝通，1989：1）。

“这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在共同抵抗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费孝通，1989：18）。在文章中，他对中华各族群之间经过几千年的迁移、通婚出现的血缘融合、文化融合给与充分肯定，这部分内容与顾颉刚先生在 1939 年写下的话语几乎完全相同。我们看到费先生在 50 年后基本接受了 1939 年顾先生对于“中华民族”的基本观念和对其特征、发展历程的描述。

但是在全面肯定“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实体”的同时，费先生仍然把“民族”这个称谓用于汉、满、蒙、回、藏等群体。这与顾先生认为“中国除了中华民族之外不存在其他民族”的观点仍有区别。他提出的“多元一体”是一个双层的“民族结构”，上层是体现了“一体性”的“中

华民族”，下层是体现了“多元性”的56个“民族”，既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同时承认56个群体也可称为“民族”。今天阅读费先生1988年这篇文章的用词和他对于“民族”问题的其他讨论时，我们必须考虑1949年以来中国国内政治的大背景。56个“民族”的官方认定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官方立场和官方话语。经历过“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并年近80的费先生，他对这些核心术语（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使用必然是极为慎重的。

1904年，梁启超先生面对国内已广泛流行的“汉民族”、“蒙古民族”等提法和国家分裂的风险时，他在用词调整方面采取的办法是建议区分出“大民族主义”和“小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梁启超，1904：75-76）。同时他认为，唯有“合汉合满合蒙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共同对外，中国才能救亡图存。梁启超先生保留“民族”一词在不同层面上的使用含义，但是努力用“大民族主义”理念来抵消汉人和其他各族“小民族主义”可能带来的危害，没有否定已经流传的现有称谓（“民族”），但是在其内涵上做出新的界定，以此避免帝国主义挑拨下中华各族之间可能发生的内斗，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实体”。在用词的选择和诠释上，梁启超和费孝通这两位先生都称得上是“用心良苦”。

### 9. 1990年代费先生再谈“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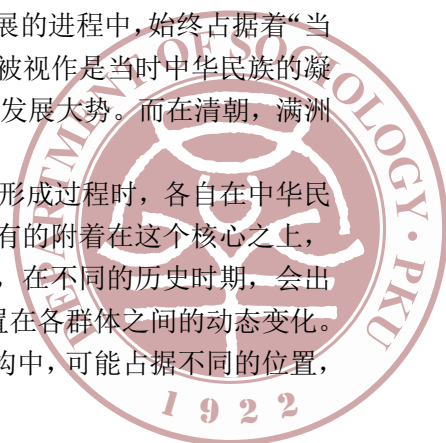
1991年的“在湘鄂川黔毗邻地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中，费先生再次提到这篇文章：“我写了一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中国有文字记载前的历史讲到现在，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分分合合，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民族群体，简单搬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民族，是行不通的。即使如此，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费孝通，1991）。

值得关注的是，在这次武陵行中，费先生对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观点进行了修订和补充。他说：“我把中华民族的核心群体叫做‘凝聚核心’。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就是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的，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包括了汉人、蒙古人在内，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连汉族的形成也不例外。凝聚是一个过程（Process），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这就是我在《乡土中国》中讲的‘差序格局’”（潘乃谷，2008）。

费孝通先生在两年前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曾特别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费孝通，1989：5）。两年之后，他在武陵山的这次考察时进一步提出：“许多群体都参与了这个‘凝聚核心’的发展过程”。这就把“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的涵盖面从“汉族”扩大到了中华民族的其他群体。对于如何理解“中华民族”这个延续几千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费先生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

这段话的第一层意思，实际上是否定了汉族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中，始终占据着“当然的”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历史地位。如在元朝时期，蒙古人就应当被视作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因为蒙古人决定着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社会的运行规则和发展大势。而在清朝，满洲旗人也应当被视作是当时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

第二层意思是说历史上许多群体在参与“中华民族凝聚核心”的形成过程时，各自在中华民族整体结构中所表现出来的态势有所不同：“有的进入了这个核心，有的附着在这个核心之上，形成不同的层次”。中国历来就是由许多各自不同的族群共同组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出现一个占据主导地位的凝聚核心群体。这里强调的是“凝聚核心”位置在各群体之间的动态变化。费先生提醒我们：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共同体中其他群体在帝国的结构中，可能占据不同的位置，





发挥不同的作用，各族之间还存在空间结构中位置的不同、权力结构中层次的不同。这一特点对于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群体关系，同样不可忽视。

第三层意思强调“以‘核心’开展的分分合合的过程，包括各民族自身的形成都是如此发展的……。凝聚是一个过程（Process），它在过程当中逐步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差序”。所以在各族竞相成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以统治全国的这个层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族群之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各族围绕着成为“凝聚核心”所展开的纷争，也导致这个“凝聚核心”群体自身不断的分分合合。在各个历史时期，每个族群从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核心”到丧失这一地位，都有一个形成、巩固、衰败的过程。

1981年在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次座谈会上，费先生在评价《中国少数民族》一书时提到：“成绩我已肯定，如果说它不足的地方，就是缺乏宏观的总结，也不够微观的调查，两头都差。今后我们就得两头一起抓，既要有宏观的研究，还要进行切实的微型调查”（费孝通，2015：202）。我们看到2009年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修订本）体例依旧，可见要想扭转一个既定的思维模式，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

#### 10. 中央政府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肯定

自费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就被国内学术界的主流所接受。随着中国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持续恶化，中央领导人越来越关注中国的民族问题。2014年9月召开的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是本世纪中国讨论民族工作最重要的会议，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长篇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费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再次得到中央政府的确认和肯定：

“这些民族经过孕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56个民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此还有所发挥：“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

他进一步提出：“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历史观、民族观。……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2014）。

我们把习近平讲话与费先生在1988年发表的文章进行比较，许多提法密切相关。如就可以看到有些话直接沿用了费先生的用语，如“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有些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如“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多民族联合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等等。而且对“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形象地说，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的提法，不仅与费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文的思路相契合，甚至可以追溯到蒋介石在1942年抗战危急时刻的倡导。那时蒋介石在西安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户、千户发表题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责任”的演讲：“我们都是构成中华民族分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样。……我们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我们的国家更是不能分割的，……我们无论属于汉满蒙回藏哪一宗族，大家同是中华民族构成的一分子，犹如一个家庭里面的兄弟手足，彼此的地位是平等的，生死荣辱更是相互关联的”<sup>1</sup>。虽然蒋介石把汉满蒙回藏称为“宗族”未必科学，但是强调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这与习近平讲话的核心观点是一致的。

现在国内已经很少听到公开反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声音了。中央领导同志对这一

<sup>1</sup> [http://www.muslimwww.com/html/2013/lishi\\_0724/17953.html](http://www.muslimwww.com/html/2013/lishi_0724/17953.html)



理论的一再确认，恰恰说明它在今天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工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 11. 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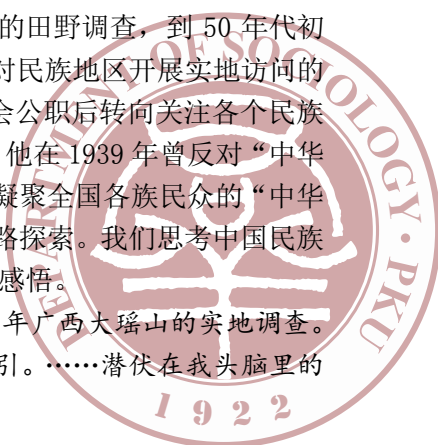
地球上的人类社会一直是多元化发展的。在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中，思考不同祖先、语言、习俗群体关系的核心概念是“夷夏之辨”，无论“夏”教化“夷”还是“夷”改变“夏”，二者都位于同一个“天下体系”之中而且有一种互动和辩证的关系。西方近代出现了“nationalism”（民族主义）思潮，建立了以“nation state”（民族国家）为政治单元的“国际体系”，随后开始了对地球上其他地区的“发现”和殖民过程。西方人类学家开始调查其他地区具有不同体质、语言、社会制度的群体，他们的研究受到本国政府、军队和新建殖民地机构的全力支持，在建立了一个新的知识体系的同时，他们的研究成果也成为进行征服活动和殖民政府考虑边界、区划和建立统治机构的参考依据。

在那些受到殖民主义冲击的传统社会，接受了西方学术训练和话语体系的学者们所需要考虑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对待本国具有不同祖先、语言和习俗的各群体，应当把本国最终建成一个“多族群的民族国家”还是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论的核心是以“中华民族”为政治单元来救亡图存、建立新国家。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蒋介石接受的“中华民族宗族（宗支）论”都可归为第一种立场。在“ethnic group”（族群）这一概念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流行之前，重视体质、语言和习俗的西方人类学传统很容易把亚非拉地区在这些方面具有差异的群体视为“民族”，把这些国家视为“多民族国家”。而在世界普遍认同“民族自决权”的年代，“多民族国家”很可能面临以“民族”为单元出现分裂的风险。苏联和南斯拉夫就是典型案例，其他承认本国属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实体（如西班牙、英国等）也难以避免“民族自决”的困扰。

在中国今天的民族问题研究中，我们学习人类学的传统理论、研究方法和经典案例，调查国内各群体（包括各“民族”内部不同群体）的体质、语言和习俗差异。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同样需要关注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政治学、社会学的学科知识来分析国内各群体之间的差异和互动关系、研究如何构建国家认同和预防国家分裂。我们不能忽视各学科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需要关注各学科在当今政治格局演变中角色和作用的转化。各个学科的知识体系（理论概念、研究方法、分析视角等）各有所长，彼此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互为补充。沃勒斯坦认为在21世纪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边界会逐渐弱化，跨学科研究将成为主流（沃勒斯坦，2002）。在对现实社会的实地调查过程中，许多学者的分析视角和主要关注点也必然会随社会演进而转变。在这一方面，理解老一代学者们的心路过程和探索足迹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工作弥足珍贵。我们需要在研究视角和方法论等各方面不断进行反思和总结，努力与时俱进，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大前提下不断推动学术创新。

费先生自1935年进入大瑶山实地调查开始，一直关注中国的民族问题。他曾遍访全国各地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留下大量讨论中国民族问题的著述。费孝通先生民族研究的足迹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从在清华大学学习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到大瑶山的田野调查，到50年代初期参与政府组织的在贵州和广西的“民族识别”工作，再到80年代对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访问的“行行重行行”。他最初从人类学传统的人体测量工作开始，担任社会公职后转向关注各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他的民族研究和探索实践断断续续绵延了近70年。他在1939年曾反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到了1988年却为新中国贡献出一个在21世纪凝聚全国各族民众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框架，其间必然有一个曲折和不断升华的心路探索。我们思考中国民族问题的后进学者们，应该能够从费先生的实践与理论探索过程中有所感悟。

他曾说“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同时我觉得只有实践也是不够的，还须从已有的理论中得到启发和指引。……潜伏在我头脑里的



史禄国老师的 Ethnos 论应当说是促成剂”（费孝通，1996：102）。直到晚年，在费先生的内心中还留下许多他一直在思考但没有最终解答的题目。例如，他多次提到：

“初学人类学时读过史禄国老师的一本名称 Ethnos 的小册子。……Ethnos 这个拉丁字很不容易翻译，它多少和我们所说的民族有密切关系，但是直译为民族似乎还有点问题，尤其是在史老师的理论里，Ethnos 包含着一大套丰富的含义。Ethnos 在史老师的看法里是一个形成 Ethnic unit 的过程。Ethnic unit 是人们组成群体的单位，其成员具有相似的文化，说相同的语言，相信是出于同一祖先，在心理上有同属一个群体的意识，而且实行内婚。从这个定义来看 Ethnic unit 可说是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民族’。但是 Ethnos 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一个个民族只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场合里呈现的一个人们共同体。……Ethnos 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也可以说正是我想从‘多元一体’的动态中去认识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一代代的人们聚合和分散形成各个民族的历史。能不能说我的这篇文章里所写的正是史老师用来启发我的这个难以翻译的 Ethnos 呢？”（费孝通，1996：104）

史禄国是人类学家，自然关注祖先血缘、语言文化和心理认同对一个群体的凝聚作用。他提出的 ethnos 后来演变成为目前西方学术界通用的 ethnicity 或 ethnic group，今天译成汉文的“族群”，这也符合现代社会科学进行国际交流的学术话语。从这个角度看，中华民族内部的这一个个“民族”（ethnos），不正是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族群”吗？

#### 参考书目：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2002，《社区与功能——派克、布朗社会学文集及学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1939，“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边疆周刊·益世报》第19期1939年5月1日。

费孝通，1986，《江村经济》，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1，“在湘鄂川黔毗邻地民委协作会第四届年会上的讲话”，《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49期。

费孝通，1993，“顾颉刚先生百年祭”，《费孝通文集》第1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26-32页。

费孝通，1999，“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费孝通文集》第十四卷，北京：群言出版社，第88-105页。

顾颉刚，1939a，“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9期1939年2月13日。

顾颉刚，1939b，“续论‘中华民国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20期1939年5月8日。

林惠祥，1939，《中国民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卢露，2013，《从桂省到壮乡：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壮族研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

马戎，2012，《中国民族史和中华共同文化》，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马戎，2015，“关于‘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研究——卢露《从桂省到壮乡》书序”，《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98期，第33-4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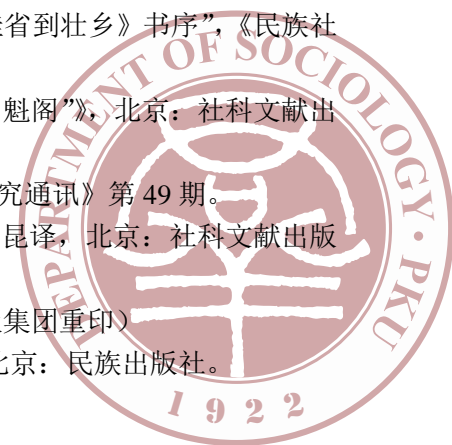
潘乃谷，2005，“‘魁阁’的学术财富”，潘乃谷、王铭铭编《重归“魁阁”》，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66-84页。

潘乃谷，2008，“费孝通讲‘武陵行’的研究思路”，《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49期。

I. 沃勒斯坦，2002，《所知世界的终结：21世纪的社会科学》，冯炳昆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王桐龄，1934，《中国民族史》，北京：文化学社。（2010年吉林出版集团重印）

吴文藻，1990，“民族与国家”，《吴文藻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习近平，2014，“在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新华社新闻稿）。

张冠生，2000，《费孝通传》，北京：群言出版社。

邹容，1903，《革命军》，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2 年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编委会，1986，《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 【论 文】

### “一切地理都是政治的地理”

#### ——从领土属性看中国民族国家之形成<sup>1</sup>

高 杨<sup>2</sup>

#### 一. “空间革命”：主权国家的领土属性

自中世纪以来的欧洲历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主权衍生和发展的历史，而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主权又是三种政治实体（普世的、民族的、地方的）相争的主要内容。<sup>3</sup>

从公元九世纪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开始，王朝之间、教派之间以及王朝与教廷之间一系列血与火的战争，一方面在国内以战争动员的方式锻铸了民族国家，打破了地方性的贵族“身份团体”，<sup>4</sup>实现了以民族为单位的政治中央集权与国家的非封建化；<sup>5</sup>另一方面，又通过战争之后理性缔结的条约，一步步地构建起现代的欧洲国家体系。在具有标志性的 1648 年，来自欧洲大部分国家的 145 名代表为结束三十年战争而协商缔结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一条约不仅结束了战争，而且承认了瑞士与荷兰主权国家的地位；通过威胁要废除任何改变宗教的君主，冻结了现存的新教国家和天主教国家的分裂，并且决定性地阻碍了哈布斯堡帝国的兼并，敲响了哈布斯堡皇室统治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丧钟。<sup>6</sup>这一条约的正式签订，标志着世俗主权王朝对普世性帝国和教廷权威的的决定性胜利，主权的内外两个维度得以逐渐成型。

既然主权是在普世的、民族的、地方的三种政治实体相争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从概念起源上来说，主权国家即与在这一过程中胜出的民族国家具有了对等性，主权国家的理想类型即历史地形成的“民族国家”，即基本上是由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政治边界与民族边界一致的那种

<sup>1</sup> 本文发表在《文化纵横》2016 年第 6 期，原刊载于许章润主编《宪法爱国主义》（《历史法学》第三卷）。

<sup>2</sup> 作者为 清华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sup>3</sup> [美] 刘晓原：“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刍议”，载冷战中国网，<http://www.coldwarchina.com/zgj/hpwj/000920.html>。

<sup>4</sup> [德]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钱永祥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3 页。

<sup>5</sup> “对外国敌人进行的战争是导致国家非封建化、消除国内自治精神和将分裂的民族力量聚合起来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参见[德]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 2008 年版，第 295 页。

<sup>6</sup> [美] 查尔斯·蒂利著：《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 990-1992 年）》，魏洪钟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年版，第 186 页。[英] 詹姆斯·布赖斯：《神圣罗马帝国》，孙秉莹、谢德风、赵世瑜译，商务印书馆 1998 年版，第 20 章。

